


上集

羅蘭
小語

羅蘭
著

台灣女作家描繪的人生



羅蘭

第二部

羅蘭小語

(台灣) 羅蘭 著

上集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第二部

责任编辑 周景芳

装帧设计 谢 鸿

书 名 罗兰小语 第二部 〈上、下集〉

编(著)者 罗兰(新佩芬)著 亦洁编选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印刷者 广州番禺印刷厂

版 次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上集6.5印张 下集10.375印张

字 数 350千字

印 数 1—120000册

I S B N 7-80542-217-6/1·55

版權貿易合同審核登記粵字第91號

定 价 8.60元

內容簡介

羅蘭女士的作品以深刻、細膩、誠懇、感情豐富、極富哲理而見長，是深受民族文化哺育的作家。我社1988年將羅蘭女士的《羅蘭小語》1-4輯編輯為上、下集出版，受到讀者空前的歡迎。現已再版三次。

爲了使更多的讀者了解羅蘭女士的作品，我們特推出《羅蘭小語》(第二部)。第二部由《羅蘭小語第五輯》《詩意的中國人》、《生活漫談》、《給青年們》四部作品組成。本輯除了在內容上與《羅蘭小語》(上、下集)有密切的聯系外，在寫作技巧上更臻於成熟、嫻美。其中《羅蘭小語第五輯》、《詩意的中國人》是她近幾年的新作，談財富、金錢、現代飛速發展的經濟和人類悠然意遠的心境，在世界裂變中產生的差異，談如何看待財富、金錢以及應對差異的人生觀，極富現實意義。

目 录

财富篇

- | | |
|-----|---------------|
| 4 | 从不屑言利到不“耻”言利 |
| 9 | 从“三顾茅庐”到自我推销 |
| 14 | 直线最短 事缓则圆 |
| 19 | 从乾隆谕旨看通商 |
| 23 | 儒医 儒将也儒商 |
| 28 | 闻过则“怒”谈文化输出 |
| 34 | “商业目的”和“自身目的” |
| 39 | 金钱反应与商业念头 |
| 44 | 文人与“市场” |
| 50 | 善胜敌者不与 |
| 54 | 嗜欲深者天机浅 |
| 59 | 以中国观点看“日本第一” |
| 65 | 中国式自由 |
| 71 | 中国式悠闲 |
| 76 | 经营之余 抬头看看天外 |
| 81 | 从“一窝蜂”到“追求卓越” |
| 86 | 四千六百年往事如昨 |
| 91 | 损失的是金钱还是自尊 |
| 95 | “跟上时代”的焦虑 |
| 100 | 中国气质与形象 |
| 104 | 什么是“美育” |
| 108 | 从“衣食足”到“知荣辱” |
| 112 | 妇女的形象代表国家 |

- | | | |
|-----|--|-----------|
| 116 | | 美式商业幻术 |
| 122 | | 走出文化附庸的瓶颈 |
| 127 | | 人生三大问题 |

寓言二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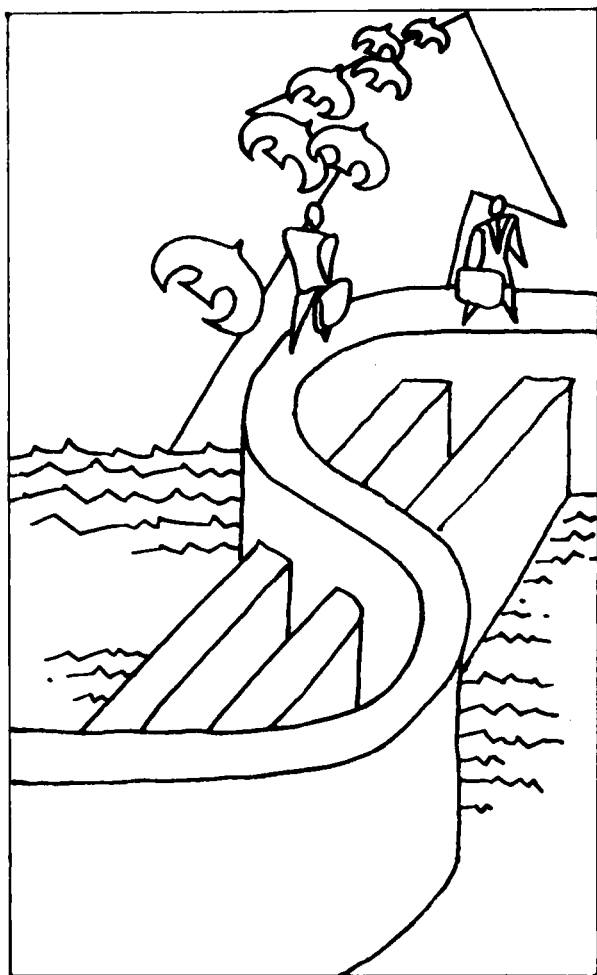
- | | | |
|-----|--|--------|
| 133 | | 孔夫子在台北 |
| 141 | | 庄周梦“钱” |

诗意的中国人

- | | | |
|-----|--|--------------|
| 152 | | 我国的诗人哲学与现代人生 |
| 162 | | 超然物外的禅境与幽隐 |
| 168 | | 道家情调的渔父与江海 |
| 173 | | 我国诗人的飘逸与豁达 |
| 181 | | 悠闲的晚年 |
| 188 | | 诗人与田园 |
| 191 | | 诗酒乐天真 |
| 198 | | 诗国与诗教 |

财富篇

——从小桥流水到经济起飞



以下这一系列文字，是在这一切以财富为主的世界潮流里，想要为我们这些不肯从“不言之辩”中退席的中国人，找出为什么我们不肯退席的原因。问一问，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要等待的是怎样一种掌声？

苏东坡的一首极具中国古老农村风味的题画诗，最能表达我此时的心境，这首诗是：

秋水参差落涨痕
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
家在江南黄叶村

窗外的车辆马达声喧。我生活在物质文明进步一日千里的现代世界，而这诗中的小桥流水，纯朴天然，充满古意之美，却使我如此悠然意远。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和这喧嚣的现代世界一直在抗衡的、广远的声音了！

我的另一些试图传达我国古人智慧的文字“诗意的中国人”，希望读者把它们做为的一组来看待，希望它们的携手同行，能给现代心情烦热的人们，带去一些清凉与清醒。

渺小的我，以生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限幸运。

我知道，很多读者都会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从不屑言利到不“耻”言利

孟子如果在今天见了梁惠王，他还会劝梁惠王“何必曰利”吗？

如果孟子这样劝他，梁惠王还会接受吗？

孟子的一句“王何必曰利”，开宗明义，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这位亚圣似乎最怕大家言利，认为如果“上下交征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大家不重“义”而只重“利”，人们就会彼此掠夺，“不夺不餍”了。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义之间也。”

大家怕做孟子所说的“ 之徒”，所以不屑言利。

至圣先师孔子对“利”早已设防，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大家怕做孔子所说的“小人”，因此耻于言利。

数千年来，全国上下，接受儒家的教训，使我们成为一个最怕谈钱的民族。

再加以道家“清风明月不用钱”的归返自然、不慕荣利的思想深入民间，使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沾上了几分飘然出尘的想法，唯恐受了金钱的污染而变“俗”。

当然，这种想法是非常超逸的，它也形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种高不可攀的超逸的气质。

“能用钱打动的东西是有价的。”因此可以收买。

“不能用钱打动的东西是无价的。”因此高不可攀。

儒、道两家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相辅相成。儒家给我们力量，道家给我们境界，使我们的民族真的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无限的深度，在任何逆境（逆境总不可避免是贫穷的）也不会覆亡。而且使别的民族由非常纳闷而开始羡慕与倾服，往往在用武力侵略战胜了我們之后，反而虚心接受了我们的思想，以致被我们所同化。

市井小民由小说、戏曲之中，吸收了“不屑言利”的文化，他们不会引经据典，却会用最口语的说法来表达不屑言利的强者姿态与骄傲。南方有一句豪语：

“大叫三声不要钱，鬼也怕！”

可以说是金钱买不动志节的最响亮、最动人的一个注解。

但是，这种轻利的观念，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它所形成的轻商的传统，使国人大部分对“利”之一字过分的规避，太缺少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意愿，因而不易改善生活。尤其在西方物质文明强大的压力之下，我们这一套由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在“贫穷即是落后”的现代商业世界里，受到了严格的考验。

代表西方的美国，是个商业大国。他们善于经营的头脑，处处以利为先的观念，和我国传统的想法刚好是强烈的对比。最早使我们感到震撼的是一件小事：“儿子给父亲做事，还要钱吗？”而美国却就是这样一个“不管你是谁，我出力，你就得给钱”的国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那岂不是“唯利是图”？但，美国却也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仿效的国家。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使他们成为世上的超级强国，不容讳言，事实胜于雄辩。

早年，有人就曾说过：“我们国家的贫弱，是受了轻商观念的影响。”

国内的忧国忧民之士，也发现富国裕民以对抗强权侵略的必要。于是开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有了今天我们有史以

来最繁荣富庶的局面。民众也逐渐由“不屑言利”改变为“不耻言利”。许多文化界人士改行从商，或在正业之外附带经商的事例也随处可见，改变了大家对“利”望而却步的情形。

犹记得在观光护照开放以前，能顺利取得出境许可的，只有商人。许多人因此千方百计，由经商的朋友那里弄张聘函，把身份证职业栏改个“商”字，以便出国。当时这种由传统轻商，一下子变为商界先有特权的现象，曾使文化界人士大吃一惊，甚至觉得是一种耻辱。但情势已是如此发展，你不能否认是商业界打了先锋，奠定了小康的基础，逐渐厚殖了财富，如今大家才都可以有钱出外观光。而且国人在外购物手面之大，已经使外人对我们“刮目相看”，莫不承认“黄面孔的观光客是肯花钱的大主顾”。谁也不能否认自己在商人的领导之下，沾光受惠这一铁的事实。文化界人士纷纷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从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轻利观念的一大突破。

“轻利”，是儒家与道家数千年来所辛苦建立的一道维护品德的堤防。问题是，这道堤防，会不会由于观念的突破，而有了溃决之虞？

如果这道堤防就此溃决了，有没有害处？

我不是卫道者，并不希望大家抱残守缺，不图更新。

我只是觉得，这世界上，如果大家都言利，而你一个人不言利；世界各国都言利，而你一国不言利，无疑的，会成为被剥夺者而无法立足。但如果人人言利，社会上充满着“孳孳为利”的“跽之徒”，大家都“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履”，恐怕也非社会之福。看看如今青少年抢夺之风，社会上为获利不择手段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犯罪，以及严重的色情泛滥，仿佛看见那由堤防缺口涌进来的滚滚浊流，令人心慌不已。

要想及早堵塞这缺口，或疏导这浊流，有没有适当的方法呢？

西方的聪明人很多,可惜我未曾遍读西方哲人的大作。只得就我一个中国人所知的想来想去,竟然还是回到了“孔子适卫”。

《论语·子路篇》,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看到卫国的人口够多了,冉有问孔子:“人口多了,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应该使人民生活富裕。”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当人民生活富裕了以后,还该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是:“教之。”

原来儒家教训里的“不言利”,不但并非不想致富,而更认为为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要使老百姓生活富裕。但是,紧接着在“既富矣”之后,就得“教之”了。

“教之”,教什么呢?

教“义利之辨”吧!

用“义”来平衡“利”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们知道在什么情形之下要“见利思义”,就不致有像美国航空管制人员罔顾国家利益与大众安危而悍然罢工的事件发生了。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教呢?

是从现在开始呢?还是等到美国人再一次问“为什么日本能而美国不能”的时候,我们再去追赶喊嚷说,日本的“能”原来是从中国抄去的呢?

* * * *

我国传统文化最可贵的一点是“不以财富为荣,不以贫穷为耻”。贫穷而清高是一项冠冕,为我国历代成功者所乐于拥有。

* * * *

一个高雅的民族,绝不是一个只会发财的民族。

* * * *

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要看社会大众在重要关键的选择。
而这选择力是来自观念,观念来自文化。

* * * * *

大众能有超乎金钱财富之上的选择,才是稳健的社会。

从“三顾茅庐”到自我推销

现代工商业社会，躬耕自食的生活已经褪色为一个古老的梦。大家都发现，自己必须与家族之外的人们去互相依存，却又必须互相竞争。因此，终日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免稍一疏忽，就错过了进身之阶。

这是一个运转迅速的世界，一切机会都稍纵即逝，因此要靠自己眼明手快去抓住，甚至去抢掠，才可把握。

西谚有云：“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和中国古老的“等待知音”的想法是多么不同！高卧隆中，等待明主的诸葛亮，如果依照这个逻辑来判断，就成了弱者。现代人为了要在那稍纵即逝的短暂时机里，迅速地获得赏识及接纳，另有必修的一课。这一课，是“推销自己”。它不是等待，也不是创造，而是“攫取”。

“推销”是商业名词。“自己”因此成为商品。

“自己”是要靠“推销”，才能有机会用世的吗？又如何推销呢？

这，得向商人请教。

首先，你不可太谦虚，也不要太孤介。

你可曾听到一个商人声称他的货品“并不太好”吗？

你可曾见到一个商人情愿把他的货品“藏诸名山，以待后世”吗？

这真使受了数千年谦恭教育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人瞠目结舌！

“不可太谦虚？”中国人疑惑地问，“难道要我们自己说自己好吗？”

答：“正是此意。”

中国人在西方商业社会里，常常因为谦虚退让而贬低了自己的价值。

最明显的是在谈薪水的时候。

西方的办法是让受雇者自己提出要多少钱。谦虚而不屑言利的中国人唯恐“高估”自己，在填这类表格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一阵折磨。有人在困扰良久之后，客客气气的填了一个中庸的数目，结果发现自己因不会“讨价”而大吃其亏。钱的方面吃亏，在一向轻利的中国人看来，倒还可以“清高”过去；自尊方面的吃亏，才真正使自视甚高的中国人难以忍受。因为，很明显，你自己要少了，别人并不因此高看你，认为这是你的“高风亮节”，反而认为你这人傻瓜，吃亏是活该。这种自尊心方面所受的打击，大概曾使不少的中国人“觉醒”了，悟到少要价并不能表示清高，而只表示你不懂行情。这是使一向不近金钱的中国读书人开始学习用商人的眼力来看金钱的原动力之一。

做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从痛苦中所得到的教训，除了“不可太谦虚”之外，也“不可太孤介”。

孤介是中国读书人时常维持的原则。为了维持原则而不惜“挂冠求去”。

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情愿回乡下去“乐享田园”，被后世传为美谈。现代人可能会建议他，“你既然看不下去那乡里小儿的作风，就该挺身而出，把他赶下台来，然后，你才有机会改革政风，矫正乡里小儿做威做福的恶劣现象。”

现代人忽略了陶渊明的受后人推崇，是在于他站在读书人的立场所树立的原则。

“成功”和“树立原则”，有了价值观念上的不同。

商业社会的特色是经商者的成败观念所形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可杀不可辱”的“士”，为了坚持原则而宁折不弯，以现代人重实利的眼光来看，那是“把事情办吹了”。宁折不弯，与商业社会的观念相抵触。经商的守则是“和气致祥”。低头折节，只是一时的权宜；“把生意做成”，才是最后的胜利，才算志气的贯彻。做生意的人不鼓励“挂冠求去”，推销员不能“宁折不弯”。如果“弯一弯”可以把生意做成，又何乐而不“弯”？

商业挂帅的社会，会产生以商业式的成功为成功的价值标准，因此也难免演绎为“以商业式的失败为失败”的荣辱观念。

“士、农”当先的社会，所产生的是以为士或务农的成功为成功的标准，因此大家也以为士或务农的失败为失败。

传统中国人的成功之路并不单单是学而优则仕，而更是把所读的书中教训实践出来。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的用处除了为官之外，更是给社会树立最高人格的典范。他们是一些标志，是原则的维护者。因此时常要像尽责的船长一样，无论多大风浪，也不宣布弃船。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己身的事业与功名，而是为了一个他们所坚守的原则。因此称之为“志节”。有志，有节，不能屈从任何外在的压力。陶渊明情愿归返田园，去过三餐不继的生活，而受到后世不断的歌颂，所歌颂的是他表现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贫贱不能移”的傲气，没有人因为陶渊明三餐不继而认为他是个失败者。这就不是商业社会的衡量标准。

林语堂博士在他的著作《吾国与吾民》中曾认为，中国人虽然历代大小战乱频仍，外患不断，但是不仅不会覆亡，反而每经一次忧患，必定更加光辉，且把征服者吸收同化，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有“贫贱不能移”的一份傲气。

很奇怪！中国读书人建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价值标准，孔子使后人觉得“富贵于我如浮云”，道家使后人觉得“贫穷是一